

RUNNING WITH

我与海明威家的男人们

(爱尔兰) 瓦莱丽·海明威 著

王婧 叶明燕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BULLS

VALERIE HEMINGWAY



VALERIE HEMINGWAY
RUNNING WITH
THE
BULLS

我与海明威家的男人们

（爱尔兰）瓦莱丽·海明威 著 王婧 叶明燕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海明威家的男人们 / (爱尔兰) 海明威著; 王婧, 叶明燕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133-0029-2

I. ①我… II. ①海… ②王… ③叶… III. ①海明威, E. (1899~1961) —家族—男性—人物评论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3068号

Running with the Bulls: My Years with the Hemingways

By Valerie Hemingway

©2004 Valerie Hemingwa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LLANTINE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我与海明威家的男人们

(爱尔兰) 瓦莱丽·海明威 著 王婧 叶明燕 译

责任编辑: 段晓楣 于 少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80×1260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二版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029-2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为了布兰登、西恩、爱德华和威尼莎

以及记忆中的

格里高利·海明威

铭记那些珍贵的时刻：

生死与变迁，

痛苦与孤独。

——T.S.艾略特

目录

.....

1	第一章	开端与终结
7	第二章	都柏林城镇: 家庭照相本
23	第三章	新时空: 伦敦和欧洲大陆
28	第四章	西班牙
45	第五章	生日、斗牛狂热, 以及一个新的头衔: 秘书
84	第六章	普罗旺斯和巴黎: 生活就像流动的飨宴
108	第七章	分离和允诺
118	第八章	古巴 1960 年
127	第九章	一周晚宴
137	第十章	友人们, 钓鱼和菲德尔
152	第十一章	来信 涉世
156	第十二章	预感
165	第十三章	再见了, 庄园
173	第十四章	重回西班牙
185	第十五章	百老汇的召唤和一场葬礼
210	第十六章	重游哈瓦那
243	第十七章	重拾 1961 年凯彻姆的秋天——他最爱的秋天
257	第十八章	1962 年, 纽约, 新生活
283	第十九章	富贵还是贫贱 疾病还是健康
307	第二十章	驴子、骡子和小马
338	第二十一章	衰亡和垮台
356	第二十二章	是说话的时候了
364	后记	



第一章 开端与终结

“死者拒绝以任何形式的演说和祈祷来纪念她的过去。”那名身着黑衣，黑发光亮、外表严肃的青年男子不带感情地宣告。这是1986年11月寒冷的一天，我站在位于爱达荷州太阳谷的一个小型墓地里。在这块我十分熟悉的空地上，我注视着一名面无表情的丧葬承办人将一个松木色的小塑料盒放置在一片由翠绿色的阿斯特罗草皮铺就而成的长方形墓地上；显然这块墓地不久前才被挖开过，而这个塑料盒或许就是购自凯马特的一个廉价工具箱。简短的葬礼结束了，两边神情肃穆、散乱站立着的人群开始朝相反的方向散开去。这时，一名上了年纪的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还记得我吗？我是乔治·萨维尔，”他看上去瘦长、阴郁。

我驱车从蒙大拿到凯彻姆是为了参加我的婆母，玛丽·海明威——厄内斯特·海明威遗孀的葬礼。在到场的来宾中，没有人



像我这样是特意跨越州界赶过来的。在葬礼上，我惟一见到的这个家族的家庭成员也只有杰克“帕比”·海明威，以及他的妻子帕克，还有他们的女儿墨菲，他们的家就在附近。见我走过来，杰克便不停地向我挥手，并示意我站在他们一家人的边上。在墓地的另一边，我认出了几个当地的老朋友，带头的是克莱拉·施皮格尔，乔治·萨维尔医生就站在他们中间。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乔治，这位厄内斯特的护理医生，同时也是在长达 25 年的时间里他亲密的伙伴兼知己。早在启程前我就获悉，玛丽的遗产管理者已经委托克莱拉照应好葬礼的各项安排事宜；我注意到，杰克，这个在海明威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大并且有确定继承权的长子却一直被冷落在旁。可以断定，如果别的家庭遭遇这种情况，一定会导致无休无止的摩擦和冲突。

葬礼结束后，我随杰克、帕克以及墨菲一块儿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咖啡馆。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家显然对这次见面都有默契，因此没有一个人提及玛丽。这是多么地不同寻常啊，我思忖着。在我的家乡爱尔兰，一次葬礼就是一场庆典，人们用故事、音乐、烤面包来纪念逝者——虽然已是天人永隔，却仿佛就在身边——无论是对于他的朋友还是敌人来说，这都是一场恰如其分的道别。一次葬礼同时还是一种怀念，意味着要把怨恨抛诸脑后，重估生命和友情的价值，它是一场发泄，一种觉醒。而我们刚刚所见到的，却更像是一件被期望而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事。没有守候，没有仪式，没有眼泪，更没有什么庆典。可是尽管这样，我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从这一刻起，我人生中崭新的一章即将开启。

人们说，历史始终是在重演。在我的人生中，旧的一章已经过去，早在 24 年前当我站立在这同一墓地的相同地点，参加厄内斯特·海

明威的葬礼时，我生命中的又一章已经开启。那天，乔治·萨维尔也同样在场。最终，他成了海明威最亲密的伙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厄内斯特才走入梅约医学中心，开始与他那糟糕的抑郁情绪作斗争。在场的还有玛丽，她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一个悲伤的寡妇，因突如其来的打击而浑身颤抖。对于她丈夫把自己打得鲜血迸流、触目惊心的那一枪，她不必再去想象。可以说，她和乔治·布朗都是那一天的见证者。

海明威的葬礼十分低调，只有受邀者方能参加。尤其是新闻记者都被谢绝入内，尽管整个世界都极盼了解详情。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争相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毕竟，20 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竟然死在了自己的手上。玛丽宣称她丈夫的死是由于清洗枪支时不小心而造成的事故，坚决否认自杀才是海明威致死的真正原因。与其说她试图向公众隐瞒事实，不如说她刻意使自己把真相遗忘。这个残酷的、让人无法忍受的真相只会使她更加的悲伤，于是玛丽陷入了矢口否认的境地。

葬礼往往成为开端与终结之间的一个句点。厄内斯特的葬礼标志着我人生中一段传奇岁月的终结。仅仅是在 2 年前，即 1959 年马德里的圣·伊斯德罗节上，我才第一次见到海明威。而到了 1961 年的 7 月，当他已经长眠于地下的时候，我却注意到了某些影响着厄内斯特一生的性格特点。马塞林纳，这个仅仅大他一点的姐姐，在幼年时期就像他的孪生姊妹似的与他成双成对，但到了少年时期，两人却成了不变对手。在这期间，我听说他从来没有和颜悦色地与她说过话。他的弟弟莱切斯特——比他小 16 岁，别人都称呼他为拜伦——从这位作家身上得到更多的也只是蔑视而非尊重，虽说两人在外貌上很相近。莱切斯特继承了暴躁的脾气、结结巴巴的说话腔调，这些



都使得他与才华横溢的哥哥相去甚远。他笨拙而又滑稽的动作经常使他那位苛刻、易怒的兄弟陷于尴尬从而恼羞成怒。还有查理·斯文内，一名 80 多岁的退伍上校，他与海明威的相识相知横跨了两次战争，长达几十年之久；而乔治·布朗，这位就在厄内斯特去世前三天还驱车把玛丽和厄内斯特从梅约医学中心送回家的人，也是除玛丽之外惟一一位在位于凯彻姆的住所内，当致命的“意外”发生时在现场的人。他的朋友兼合作者 A·E·霍奇的缺席是最引人关注的。霍奇很快就将因他自己所著的《我的父亲海明威》一书而远近闻名。可以说，霍奇是厄内斯特生命最后岁月里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而在海明威死前的几个月里，他也成了玛丽的心腹朋友。可是最终，玛丽却无法制止霍奇的这本回忆录出版，这对于她来说，显然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对于友情的背叛。

经过反复的斟酌，这些人都逐一受到了检验，于是发现其中的有些人其实并不够格。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我过去从未曾谋面，但对于每个人我都略微有些了解——了解他们各自对于海明威的意义，而现如今，他们也因介入了海明威的记忆而深感自豪。

也是在那一天，当牧师刚结束对死者的祷告，我就感觉到有一只手突然搭上我的肩膀。我转过身看见一个貌似海明威的人，他看上去就像是 15 年前的海明威——他是莱切斯特。见我回头，他便低声急切地问我：“夫人您知道我的手稿现在何处吗？”他指的是他在 1960 年的春天，寄到瞭望山庄给厄内斯特的一本自传。那天，当厄内斯特一看到这份手稿，便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之情。“如果拜伦想要钱，为什么他不直接开口问我要呢？”说着就边发脾气边提起包裹走出了藏书室的大门，并随手把它扔进了一个供燃烧的桶里。他往桶里倒了些

易燃的液体,然后划了根火柴。火焰迅速缭绕着窜入了阴沉的天空,浓烟慢慢地散入了温热的空气,哈瓦那的美景以及远处的港口在烟雾的笼罩下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几个小时之后,厄内斯特才渐渐恢复了平静。无论是那时,还是此后我从来也没有向莱切斯特透露过他的劳动果实的下场。

直到我在厄内斯特葬礼的前两天到达太阳谷的时候,玛丽才想起我正在为《新闻周刊》工作,于是她很后悔邀请了我。沉浸在悲伤中的她以为我可能会利用这次邀请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她肯定是这么想的)。确实,在《新闻周刊》准我假的时候,他们为能有机会获得轰动性的新闻而无比兴奋,并向我提出要求让我考虑,但我马上给予了拒绝。可是如今,我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个局外人,被排除在他们的家庭聚会以及短程旅游之外,这让我痛苦不堪。我很懊恼,并为自己就这样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而感到气愤。然而,命运,就像它通常所做的那样,又扮演起了自己的角色。我出现在厄内斯特葬礼上的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我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并陪同玛丽回到古巴,开始着手整理厄内斯特的所有财产。接着,凭借着足智多谋,我们设法把价值百万美元的绘画作品、价值连城的手稿、信件以及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从瞭望山庄带回了美国,而在那个时期的那个地区是不允许带走任何东西的。随即,查理·斯克里布纳^①在他位于第五大街的大楼的第十层,给了我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我就在那里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阅读和整理有关海明威一生的每一张纸、每一份手稿和每一封信件。

^① Charlie Scribner 是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出版商。

还有一件对于我来说更为意味深长的事，缘起于我出席的厄内斯特的葬礼。这得从他最小的儿子说起，格里高利与他的父亲长期疏远。在我逗留海明威家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名字从不允许被提起。由于海明威本人从不谈及此事，我也就无从了解他的儿子何以得不到他的宠爱。这个被唤作吉吉的人，与我一样，在这次葬礼中也不被接纳。因此，他也同样地感觉无所适从。作为两个局外人，不论是各自独坐在克里斯钦尼亚之屋的休息室里，还是漫步在这个牛仔小镇，我们总能遇到对方。后来，我们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而这种关系最终把我们引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与格里高利的生活在美妙、激动人心的同时也夹杂着令人不快的争吵。在玛丽的葬礼上，我们的婚姻也同样走到了尽头。当时我们正在办理离婚诉讼。开始却又结束，结束却又意味着开始。

第二章 都柏林城镇：家庭照相本

我一出生便注定了横在我前方的将会是一片艰难险阻。我的家庭与童年生活一直充满着矛盾与不和谐，并且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荒谬。

1940年，我出生于都柏林一个英裔爱尔兰人家庭，父亲生长在爱尔兰，是一名新教徒；母亲则信奉罗马天主教，一直把伦敦当作自己的家。当时，都柏林是一座外省的小城镇，仍然停留在那个修饰着花边、束腰的维多利亚时代。每当主显节或复活节，我在都柏林亲戚家的餐桌旁都能轻而易举地体会到约翰·休斯顿的影片《死者》当中的情节。差不多50年前，詹姆斯·乔伊斯^①就曾经描述过这个城市，过去的景色仍然在延续着，在潮湿而又不通风的都柏林中产阶级的

^① James Joyce, 爱尔兰作家，作品有《尤利西斯》。

起居室里，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改变。起居室里直立式的钢琴，一种叫做蜘蛛抱蛋的植物，盖在塞满填充物的椅子上的罩布，还有那些故作优雅、暗藏机锋的谈话——这一切装饰了我的童年，成为那一段生活中最精彩的部分。

在我们家里，排定座次更多是依据宗教而非政治因素。开玩笑、朗诵诗歌、畅谈文学作品、唱歌，以及宣读我姑母康斯坦茨写的讽刺小品，使得许多个夜晚变得就像是在过节似的。“老处女”，对于这个我父亲的妹妹中年纪较轻的姑母，我的母亲常常如此不屑地称呼她。康斯坦茨在多尼勃劳克一家收留绝症病人的第一流医院做挂号员。她个子矮小，嗓音低沉（“像个男子”，我母亲常这样说她），念起对白来才思敏捷。和我父亲那年长的姐姐、我的姑母艾莲的可爱动人比起来，康斯坦茨说的那些尖刻的话可比蛇的牙齿还要锋利。“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我那与这些聚会总有些格格不入的母亲常这样警告我们。艾莲的情绪永远是那么的高涨，然而她那苏格兰的丈夫、我的祖父亚历克的脾气却是十分地粗暴，所以每次他一出现，那军人般的行为举止和刺耳的嗓音总能让我们感到坐立不安。守时是他经常抱怨的问题，他无时无刻都要拿出他那配着一根银表链的怀表来看，以确保生活是按照这滴答滴答的钟表声在走着的——当时在爱尔兰已经发明出这种怀表了；至少在这里，它从不被理会。亚历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毒气中毒而患上了哮喘，他总是会很猛烈地咳嗽，声嘶力竭的喘息声已影响到了他的健康以及孩子们。

我还记得我出生时的屋子，它位于斯丁洛根，是一幢独立的石头建筑物，有着石板瓦的屋顶和巨大的八角窗，在它的前面，带有大平台的庭院里种满了鲜花。就是在那个花园里，我经常与彼得，我那因

为要与一个新来者分享他的父母和所有而大光其火的哥哥一起玩耍；也是在那里，我开始对这个世界有所认识。

我的父母看上去并不般配。我的父亲汤姆，他头发稀疏，长着一双蓝眼睛，中等身材，当他娶我母亲的时候，正值而立之年，当时的他还是个英俊潇洒、能说会道、体格健硕的男子。我的母亲米莉森特，她那黑亮而髻曲的头发、浅褐的眼睛和动人的微笑则无不饱含着高度的傲慢与超乎现实的期待。结婚那年，她正好 29 岁，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家和舞蹈家，虽然倨傲不逊，但却风度翩翩。当年，正由于没有一个男子能入她的法眼，她才迟迟不愿出阁，而现在，她却迫切地想要结婚，就因为那该死的 30 岁生日已经迫在眉睫。30 岁出头就是老处女了——这在她眼中比嫁给一个不太中意的人还要糟糕。

我的母亲出嫁时穿着她母亲的婚纱。他们的结婚照片令人遐想：这一对郎才女貌、喜笑颜开的夫妻面前展现出的的是无穷的可能性。度完蜜月后他们



他们的结婚照片令人遐想。（1936年12月5日）

搬到了位于都柏林的一处舒适的高档居住区，配有专门的厨师和客厅女佣；适宜于他们的社交生活：打网球、划船、聚会；还有一个由于两家望族联姻而产生的新名字：丹比—史密斯；当然他们前途无量，我父亲对未来充满希望。

1939 年爆发的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爱尔兰人的生活方式。尽管爱尔兰在政治上一直保持着中立，但它离英国实在太近了，因此不可能不受到战争的影响。食物是定量配给的，炸弹则时刻在威胁着他们的首都都柏林，因为它离威尔士的海岸线只有短短 56 海里。在我早期的记忆中经常有防毒面具和防空洞这类东西。事实上，爱尔兰始终



我的出生给父母亲重新带来了希望和快乐。

(1941 年 5 月 5 日 周岁生日)

对于该支持哪一方而举棋不定。虽然英国一直以来都是爱尔兰人民的压迫者，但是却有无数爱尔兰人为了生计在那里工作，在本国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情况下，英镑使得很多爱尔兰家庭得以维持下去。

到了 1943 年，我父亲抓住一个机会，从而得以离开爱尔兰；在这之前他做生意失败，没有正规的工作，酗酒

并且好赌。尽管已经 40 多岁，但他还是加入了英国军队并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他离开了他那心烦意乱的女子和 3 个孩子，并留下了大笔的债务。

当我 2 岁零 3 个月大的时候，我的弟弟罗宾出生了。与我出生时那个阳光灿烂的 5 月天下午不同的是：我给父母亲重新带来了希望和快乐，以及对于将来美好的展望；而我弟弟的出生则预示着灾难。当时，父母亲的婚姻宣告失败，家庭也面临着四分五裂，以至我的母亲身心疲惫，生活一落千丈，顷刻间跌到了最低点。此时此刻，她已经没有能力再去照顾另外一个孩子了。事实上，我和彼得直到成年以后才知道还有罗宾这样一个弟弟的存在。

我和哥哥对即将到来的悲剧完全不知不觉，我们一如既往地在我们家美丽的花园里玩耍，保姆、厨子和女仆则照顾着我们两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父母亲可能会来来去去，但我们的日常生活却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说当时我确实注意到有些什么变化的话，那么现在的我也不可能再回忆起来了。直到我 3 岁那年的某一个寒冬，我父亲的妹妹康士坦茨姑姑不祥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父亲的家人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家。我母亲和父亲家的姑姑们从来都是互相不喜欢甚至是互相看不起的。没有留下任何的解释，我和彼得就被康士坦茨姑姑的黑色小汽车很快给带走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都柏林的北面，那儿环境严酷而又暮气沉沉，已经显示出了某种破败的迹象。我们的车子一路驶过一排排的简易住宅，最后在一幢由高高石墙围起来的宏伟庄园入口处停了下来，庄园的两边一直延伸到了视线所无法企及的远方。一个戴着黑头巾，穿着白长袍，模样古怪的人出现在门房处，他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银钥